

从“消灭”到“创造”:马克思对德国浪漫派反讽思想的倒转

陈艳波 陈 漠

摘 要 马克思与德国浪漫派思想的关联越来越为学界关注,这为我们进一步厘清马克思思想的来源以及理解马克思创立新哲学的问题意识和思想契机提供了新视角。就此而言,德国浪漫派的反讽思想可以成为我们理解马克思早期思想产生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切入点。面对启蒙思想对世界的祛魅,德国浪漫派希图借助反讽思想来重新为人唤回精神和神性,但因反讽思想的内在矛盾而陷入了理论困境。在继承黑格尔改造德国浪漫派理论的基础上,马克思取消了作为人类精神异化的绝对精神,将人的主体性提升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实现了反讽思想从否定性的“消灭”向肯定性的“创造”的倒转,不但化解了德国浪漫派反讽思想的理论困境,而且为反讽思想的现实化找到了“无产阶级”这一积极的革命力量。

关键词 马克思;德国浪漫派;反讽思想;无产阶级

中图分类号 A121;B0-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22)02-0048-10

基金项目 贵州大学文科重点学科及特色学科重大科研项目(GDZT201704);贵州省研究生科研基金项目[YJSKYJJ(2020)072]

根据维塞尔的考察,马克思思想的产生和发展与德国浪漫派思想存在密切关系,马克思理论继承并发展了德国浪漫派的一些核心观念,维塞尔甚至认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本质上是浪漫诗歌的变形,无产阶级是“诗歌的形式”,是“反讽的化身”^[1](P1)。维塞尔的观点显然还需要进一步商榷,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肯定不只是浪漫诗歌的变形那么简单,但他对马克思受德国浪漫派思想影响的强调确实为我们理解青年马克思的思想拓宽了思路。实际上,德国浪漫派是马克思早期思想的重要来源之一,马克思在继承德国浪漫派核心观念的同时也对其进行了积极改造,这种改造的成果之一就是完成了对浪漫派反讽思想的倒转,倒转了的反讽思想成为马克思告别德国浪漫派和德国观念论,走向历史唯物主义和构想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重要标志。近年来,国内学界越来越关注马克思与德国浪漫派之间的思想关系,并从马克思的现实理论、美学理论、人学理论等方面展开了考察^①,但还鲜有从反讽理论的视角对二者思想关系的研究^②。有鉴于此,笔者旨在此方面做一些探索。本文主要意在阐明以下问题:马克思倒转浪漫派反讽思想的原因、具体方式以及这种倒转了的反讽思想与无产阶级革命间的内在关系。

① 刘森林立足于“直接的现实”和“本质的现实”的区分,论述了马克思是如何批判并超越德国早期浪漫派的^[2];美学方面,有学者认为从马克思的“真正现实”和“真正本体论”两个维度可以澄清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争论^[3];还有学者从马克思人学理论出发,主张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吸收了浪漫主义现代性批评的积极方面,并在理论上超越了浪漫主义,实现了现代性批判的人类学视角的一个根本性转变^[4]。

② 刘森林指出,马克思的反讽不是审美反讽而是实践反讽,在告别意识内在性的同时保留了价值内在性。但刘森林没有对马克思实践反讽,尤其是实践反讽与马克思革命理论的内在关系进行考察^[5];刘军从诗歌形式的方面考察了马克思早年诗作中运用的反讽修辞方法,但未从主体哲学和革命理论层面对马克思的反讽思想进行考察^[6]。

一、德国浪漫派反讽思想的困境与黑格尔的改造

尽管对德国浪漫派的本质界定一直众说纷纭,但将其视为一种对现代性的批判理论已基本成为学界的共识:“浪漫主义运动……是对各种普遍性的激烈反叛”^[7](P15),“浪漫派的反讽肇始于……一种结合了不可企及的自我批判意识的体系”^[8](P12),“我们可以把浪漫主义概括为‘现代性的第一次自我批判’”^[9](P96)。因此,我们理解德国浪漫派,可以从他们所批判的启蒙普遍性和现代性开始进入。浪漫派批判的这个普遍性和现代性有这样几个方面的体现:一是数学和定量思维方式成为解释现实的基本模式;二是以自明性的第一原理为基础构建的知识体系成为人类知识的理想追求;三是根据数理的解释模式构建了机械化的世界图景;四是以技术化、工业化和资本化为特征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日益成为人类主要的生存方式和境况。这些特征都与一个概念相关并可以用这个概念来概括——“启蒙运动(Aufklärung)”。德语中“Aufklärung”的本义是“解释、澄清和说明”,因此启蒙运动在根本上就是一场对人和世界进行“解释、澄清和说明”的运动,这就在本质上要求人们运用理性去照亮世界,将世界置于理智之光中,驱散笼罩在人自身与自然之上的无知阴霾。理性作为自然之光,作为照亮世界的方法,在启蒙时代被具体化为解释世界的数理模式。按照这种解释模式来观照,自然被简化为可量化的数值,可通过普遍性的公式预测和计算。在一个被启蒙了的世界里,自然的秘密连同其神圣性被科学话语驱逐和祛魅,“诸神不再在自然中言说,也不再藉着自然而说,自然在运动中变成了无灵魂的原子的”^[1](P23)。“无灵魂的原子的”构成的自然成为没有精神、没有神性的世界。

没有灵魂的世界反过来造就了没有灵魂的人,世界自身失去神性的同时,栖居其中的人也失去了通往神圣的道路。当科学的话语取代诸神在自然中的言说时,古老的、象征性的诗歌的语言也被一同取代。然而,浪漫派坚守着古老的传统,认为神圣的“一(Einheit)”遍布在自然万物中并作为永恒的精神支配着万物,感性的自然是精神的自我表达,是精神自在的言说,无论是人的话语还是自然的符号,都应该体现和言说精神的神圣性。浪漫诗人的使命就是把自然中精神的语言转化为诗,转化为精神之歌,把精神自在的言说转化成自为的言说,把隐藏在万物中的精神释放出来,“他们力图把经验世界转化为一首诗,一个梦……因为梦是精神的声音;梦真正是精神自身”^[1](P7)。通过诗化世界,人和自然在与精神的交融中达到统一,实现个体自我与自然、精神相统一。然而,启蒙理性把精神从客观自然中驱逐到了单纯主观的思维领域中,自然的精神性被科学的语言掩盖,自然不再是精神的自我表达。浪漫诗人面对一个启蒙了的世界,一个只有数字和公式但没有精神的世界,他不再能从自然中听到精神的话语,不再能感受到自然中的神性,总之,他无法再作诗了。因此,启蒙时代失去精神的不单是自然,那唯有通过诗化自然才能与精神合一的人,同样也失去了通向精神的道路。

为世界和人重新唤回精神和神圣性,成为德国浪漫派的根本任务:“浪漫主义力图在大地上建立上帝王国,努力构建一种新的神圣文化,力图以诗歌的魔法征服死亡。”^[1](P29)当然,通过自然来回归精神依然是德国浪漫派坚守的原则。然而,被启蒙数理化了的自然变成了没有精神的客体,不再是精神的自我表达,相反,自然作为冰冷的对象堵塞了通向永恒精神的道路。在这种背景下,德国浪漫派面对的问题就是,如何重新在客体上揭示精神,使其成为主体通往神圣性的道路。德国浪漫派从费希特的知识学理论中获得了灵感:无限的本我(精神)是一切有限性的根据,既是人有限的经验自我的根据,也是作为有限的非我(客体)的根据,而这意味着有限的自我和自然都被统一在无限的精神之中。通过把无限的精神设定为有限主体和有限客体的共同根据,客体就不再是与主体分离的客体,而是包含了潜在精神规定的非我,它通过与本我对立的方式与精神相联系;同时,对作为有限主体的人而言,每个独立的个体既是个体的、有限的自我,也是最高精神的主体性的具体展现,在这个意义上人是精神的代言者。以此方式,主体和客体就被统一在具有更高规定性的精神之中,有限和无限之间就形成了一条道路,精神自身就构成了这条道路,它必须参与世界历史,它必须是作为沟通有限和无限的“生成(werden)”,这个生成

就是精神自我实现的过程。

通过精神的自我生成,德国浪漫派找到了沟通主客体从而实现返归精神的道路。那么,这条道路具体如何开展呢?在德国浪漫派看来,返归精神的道路就是作诗。在诗中,诗人并不停留在事物上,他用象征性的语言揭示事物背后的精神,并在这种象征中使有限与无限合一。诗人作诗的动力来自一种冲突、一种矛盾:对客观世界和主体自我的有限性的感知与主体内在的对无限性的诉求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冲突和矛盾转化为一种内在的渴望,督促人把有限转化为无限。这种转化在本质上构成了德国浪漫派反讽思想的核心:“通过‘消灭’有限的自主性,为了实现更高统一的转变,人有能力开发自己的神圣无意识,从而获得必要的能量。这种创造性的消灭力量本质上是浪漫派的反讽。”^{[1](P54)}可以说,反讽思想的实质是一种转化着的反讽,是一种创造性的消灭力量,它通过把客观事物转化为主观事物,转化为非我,从而消灭了客观事物,创造了具有精神性的非我,以无限的精神统一有限的自我和非我。据此,德国浪漫派认为,事物的客观性是一种假象,是启蒙以来的科学理性固执地把事物视为独立的没有精神的客观实体而造成的。反讽作为自觉的精神就是要否定、消灭事物的这种客观性,揭示它们的精神本性。换言之,反讽思想内在要求将事物从这种客观性理解的压迫下解放出来,而转化为一种基于精神和意志的主体性理解。

然而,浪漫派的反讽思想却是自相矛盾的。因为反讽把有限转化为无限需要通过消灭对象的客观性来实现,这种消灭既是目的也是根本动力,这就使反讽思想陷入了二律背反的困境:若反讽要继续下去,则对事物客观性的消灭就不能停止;若反讽永无止境,有限的主体就永远不能真正复归精神。希望沟通有限和无限的反讽思想,事实上却造成了有限和无限的永恒鸿沟:“这是永恒的鸿沟,倘若渴望打算保持运动,就得保留这一鸿沟……作为自己目的的反讽,要求渴望主体和渴望客体之间有一道永恒鸿沟。”^{[1](P71)}在这条鸿沟上永无停歇的渴望最后就变成了绝望。反讽思想作为德国浪漫派弥合主体与客体、自我与精神的希望,最后又以反讽的方式亲手终结了这一希望。同时,人通过反讽思想转化自然的有限性从而返归精神的过程,也是精神自我实现的道路,因此,精神同样面临反讽思想的二律背反。显然,德国浪漫派在试图用无限的精神来统一主客体,取消对立事物的客观性的同时,也把精神推向了绝望的深渊,因为无限的精神在消灭有限性的同时也消灭了自己。

浪漫派的努力并不成功,但德国思想界并未就此放弃浪漫派的理想,他们继续寻找别的方法来为世界和人唤回精神。在所有那些对浪漫派继承、改良和批判的思想家中,黑格尔是较为特殊的一位,这首先是因为“黑格尔既源自于浪漫派,又把自己规定为反浪漫派”^{[10](P1)},他以批判这种特殊方式继承了浪漫派;其次,相比同时代的哲学家,黑格尔的思想对马克思的影响最大,“黑格尔是浪漫派的敌人,却成了马克思的导师,不是因为黑格尔抛弃了要主观化客观性的浪漫派命令,而是因为他提供了抓住这种权力的有效的方法”^{[1](P145)}。黑格尔继承了浪漫派的两个核心观念:他坚信精神的第一性,认为精神具有最高的主体性;他把精神视为需要人和自然共同完成的自我发展的道路。但同时,黑格尔也深知浪漫派的缺陷,他坚守的理性主义立场使他公开地批判浪漫派,甚至成为浪漫派最大的敌人。

黑格尔对浪漫派的批判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黑格尔反对浪漫派把艺术置于最高的地位。在黑格尔看来,哲学、宗教和艺术并非同等地位,哲学作为精神的自我显现是“绝对知识”,呈现着精神的真正内容和形式,它作为最高层次的“科学(Wissenschaft)”统领着宗教和艺术:“这门科学是艺术和宗教的统一……是艺术和宗教的思维地认识了的概念。”^{[11](P335)}其次,黑格尔反对浪漫派将直观(艺术)作为沟通有限与无限的中介。因为在黑格尔看来,未进行反思的感性直观只能揭示事物的表象,而不能触及事物的精神,无限的精神和有限的经验世界之间的统一不可能在直观中实现。相反,黑格尔认为,只有理性思辨才是把握绝对精神的恰当手段,只有理性思辨才能真正实现精神的自我意识,哲学作为理性的知识呈现出了精神的本质:“这个自我意识就是理性,这个理性作为这种同一性不单是绝对的实体,而且是作为知的真理……这个进行着知的真理就是精神。”^{[11](P209)}这也是黑格尔把哲学置于艺术之上的一个

重要原因。最后,也是对马克思影响巨大的一点是,黑格尔不同意浪漫派对人的主体性的消极态度^①,相反,黑格尔积极地把主体性赋予人。在黑格尔这里,精神通过哲学自我显现,哲学又凭借人的理性呈现自身,这意味着精神在人这里获得了自我意识,人具有了精神的主体性,甚至成为精神的最高化身。“这里,我们看到了黑格尔主义和浪漫主义之间对立的核心。黑格尔认为人的神性是积极居有的权力”^②,将人的主体性视为精神主体性的居有和表达。黑格尔极大地高扬了人的主体性,居有这种主体性的人就可以以精神之名来完成对世界的征服。这个征服的过程可以概述为:人运用自身的权力(理性),运用高于客体的创造性(主体性),把外在客体内化为精神,完成精神从理性观念到现实世界的转变,这一过程的结果就是主体与客体的和解以及精神的自我完成。以此方式,黑格尔在人的观念中完成了对外在事物客观性的革命,精神通过人的理性实现了对世界的征服。

在黑格尔这里,人尽管居有和显现着精神的主体性,但并不就是精神自身,也不能完全等同为精神。因为人永远只能作为有限个体,这种个体的有限性与精神的无限性有根本的区别,并阻碍了精神主体性的实现。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如何使作为个体的有限的人上升到无限的精神。在黑格尔看来,这正是社会或共同体(Gemeinwesen)的意义。精神自身运作在所有个体中,个体因拥有了精神而律动,精神以这种方式支配着由无数个体构成的整体的运行。受精神支配的个体并非散乱的个体,他们组成系统的、有机的整体,精神也通过无数个体存在于整体中,这个整体在黑格尔的理解中就是社会。在这个意义上,社会正是无数以精神为本质的个体的“普遍一本质”(Gemeinwesen):“伦理实体是一个现实的实体,是一个通过实存着的意识的多样性而得以实现的绝对精神。这个绝对精神是一个共同体。”^[12](P273)在这里,个体和社会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个体是独立的意识主体,社会只有借助来自个体的反思才能获得具体的规定;另一方面,个体意识也必须在社会中才能获得自我规定,“个体的命运是要成为意识的镜子,反照社会集体神圣创造性”^[1](P150-151),个体唯有通过社会才能通向无限的精神。就此而言,社会和个体是不可分割、相互成就的存在,他们共同构成了精神的现实王国。

尽管黑格尔赋予了人征服世界的权力并给出了通向无限的方法,但他仍然没有彻底完成从浪漫派那里接续的使命——实现有限与无限、经验与神圣的统一。虽然黑格尔以社会为中介来使有限个体走向无限的精神,一切有限性也确实都被反思进了精神的总体之中,但这是通过思辨的手段进行的,以哲学的方式完成的。易言之,在黑格尔的哲学中,或许确实存在一个总体,然而它仅仅是抽象的思维的总体,而非经验的现实的实体,也就是说,黑格尔只是在哲学的理性思辨层面而非事实经验层面完成了有限与无限的统一。理性思辨与经验事实、神性理想与人性现实之间的距离成为黑格尔无法跨越的鸿沟。黑格尔不仅没能在现实经验层面完成有限与无限的统一,甚至还否定了哲学能够和解思想与事实、理想与现实之间鸿沟的可能性。在他看来,哲学的全部任务就是通过反思实现精神的统一,因而对于思想与现实的和解,哲学是无能为力的:“但该和解本身只是个局部的和解,并无外在的普遍性……暂时的、经验的当下如何从其分裂中找到出路、如何自我塑造,则不得留给世俗世界,而这不是哲学直接的、实际的事业和事务。”^[13](P252)

无疑,通过人的主体性征服世界,统一有限与无限的任务在黑格尔这里并没有完成,但他对人的主体性的极大高扬,与德国浪漫派的反讽思想一道,成为马克思化解思想与现实之间矛盾的思想来源。简言之,马克思的方案为:倒转反讽思想,让它从“创造性的消灭力量”转化为“消灭性的创造力量”。

① 德国浪漫派对主体性的消极态度源自反讽思想自身的理论困境:若反讽意味着主体性的自我消灭,为了避免这种消灭,只能放弃反讽思想的诉求,放弃诗化世界这一主体性命令,最终放弃主体创造世界的冲动。这种消极态度在后期浪漫派那里尤为明显。

② 需要说明的是,维塞尔认为黑格尔理论中的人“居有(aneignen)”了主体性,但我们认为,在黑格尔那里人还只是“拥有(haben)”而非真正“居有”主体性,这两个概念的区别下文会进行解释^[1](P141)。

二、反讽思想的倒转与人的感性实践活动

“马克思超越了黑格尔,在我看来,马克思保留了思想和现实之间和解的理想。然而,他却转向了浪漫派的哲学观,即转向了作为反讽的辩证法的哲学”^[1](P163)。换言之,在马克思那里,反讽思想作为实现理想和现实和解的根本方法被重新接纳。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虽然接纳了德国浪漫派的反讽思想,但却倒转了它的内涵,使之成为从消极转化为积极,从否定转化为肯定,从消灭转化为创造的反讽。这种倒转之所以可能,主要在于马克思实现了对人的理解的变革。在马克思的理解中,人是真正的主体而非黑格尔那里的精神的代理,是真实获得了全部主体性的自由的人,他通过感性实践活动在对象上全面地释放自身的可能性,现实地实现和确证自身的本质力量。在这里,人的感性实践活动正是马克思倒转反讽思想的关键。下面我们详细地考察这一点。

如上文所言,黑格尔通过赋予人以精神的主体性,极大地高扬了人的主体性地位,让人拥有了征服世界的权力。马克思则把这一思路彻底化,他通过取消在黑格尔那里拥有全部主体性的绝对精神,将全部的主体性赋予人,使人成为真正的主体和最高的主体。在马克思看来,不存在一个如德国浪漫派和黑格尔所言的超越人的精神或上帝,它只是人主体性的一种抽象和异化,上帝或精神不过是居有了全部主体性并将这种主体性现实化的人,他才是世界和历史的真正创造者:“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14](P89)换言之,在黑格尔那里,人居有主体性只是假象,真正居有主体性的是绝对精神,人最多只是拥有主体性,而在马克思这里则不同,由于他将上帝看作人类精神的异化,人就完全居有了主体性。居有主体性与拥有主体性的区别在于,前者意味着主体性从人的本质而来,人和主体性的关系是一种内在关系,主体性就是人,人就是主体性,二者可以相互定义;后者则意味着人自身不是最高根据,他被一个更高的存在支配,因而主体性也不内在地是属人的,而只是这个更高存在分配给人的东西,人和主体性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外在关系,他们之间必须通过更高的存在才能关联。如此一来,自近代以来哲学对人的主体性地位的高扬,在马克思这里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马克思收回了人遗失在精神或上帝那里的主体性,让人居有全部主体性,成为真正的主体和世界的最高根据。就此而言,马克思是近代主体哲学的巅峰,他让人真正成为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

因为人和自然界的**实在性**,即人对人来说作为自然界的存在以及自然界对人来说作为人的存在,已经成为实际的、可以通过感觉直观的,所以关于某种**异己**的存在物、关于凌驾于自然界和人之上的存在物的问题,即包含着对自然界的和人的非实在性的承认的问题,实际上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了。^[14](P89)

人居有全部的主体性,这是实现反讽思想倒转的前提条件,因为只有当人成为真正的主体时,才能把反讽的消灭转化为创造,把消极的反讽思想倒转为积极的反讽思想。这种倒转,是马克思克服德国浪漫派反讽思想内部矛盾的关键环节,同时也是他超越黑格尔观念论哲学的一个典型体现。在德国浪漫派那里,转化着的反讽是反讽思想的核心,是精神自我运动和发展的根本方式,它在有限的客体中发现主体性,并通过主体性消灭有限的客体,最终回归无限的主体。但正如上文所言,德国浪漫派的反讽思想由于其目的和动力都来自消灭有限性,因此它的结局要么是落入无休止地对有限性的消灭,要么就是在消灭一切有限性之后转变为自我消灭。可以发现,反讽思想内在地要求主体成为最高创造者或最高根据,因为要实现从有限到无限的转化必须借助人才完成,因此从根本上说,人才是真正进行转化活动的主体,人就是这个反讽着的精神。但是,由于德国浪漫派相信人类在本体论上依附于神圣、精神或上帝,人的主体性是由更高的存在赐予的而非自身居有的,这就强行贬斥了人作为最高根据的地位。这正是德国浪漫派的限度,同时也是反讽思想困境的症结所在。在对精神第一性的信仰上,黑格尔与德国

浪漫派没有本质区别，他未能彻底完成理想与现实的和解也正是因为他还迷恋绝对、无限的精神。就此而言，黑格尔和德国浪漫派一样，都在构造一种“创世理论(Schöpfungstheorie)”，在寻求世界的最初和终极起源中成为传统形而上学的继承者，只是浪漫派用诗的语言去象征，而黑格尔用理性思维去规定这个起源。

当浪漫派和黑格尔把抽象的精神视为世界的最初和最高根据时，事实上他们已经“把自然界的存在和人的存在抽象掉，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14](P89)。之所以没有意义，是在于这种抽象戕害了人的主体性。它首先把精神异化成世界的本质，然后再让世界通过反讽或扬弃活动消灭一切对象而复归精神。然而，这种消灭在完成复归的同时也导致了主体性的自我消灭。所以，在这种理解中上帝或精神成为人的主体性的敌人，在上帝或精神面前，人的主体性是丧失的。马克思揭示了黑格尔把精神异化为人和世界本质的错误的根源。他认为，黑格尔一方面把“人仅仅表现为自我意识”^[14](P97)，用精神冒充感性和现实生命，将精神异化成人本质，另一方面又把世界理解为“人的世界在精神上的普遍存在”^[14](P107)，将精神冒充为世界的本质，把世界解释为精神的外化。但是，作为精神的自我外化，人和世界终究只是“一种非现实的、非感性的、只是思想上的即只是想象出来的存在物，是抽象的东西”^[14](P104)。因此，精神所谓通过外化实现自我的过程，最终仅仅是它在自己思辨中的循环，无法真正地超出自身面向真实的人和世界。马克思敏锐地洞见到，当抽象的精神试图把一切都纳入自身之内时，它就已经拒绝面对真实的无限丰富的人和世界，失去了在现实中证明自己的可能性，而只能在浪漫的诗歌和抽象的思辨中自我消灭。

通过批判黑格尔，让主体性彻底复归于人，马克思完成了倒转反讽思想的前提。在这个前提之上，马克思展开了对反讽思想的倒转。我们认为，人的感性实践活动正是这个倒转了的反讽，因为感性实践活动是人实现自身主体性的方式，通过它，居有全部主体性的人创造而非消灭世界。这里的创造是马克思实现反讽思想倒转的关键。对此可以这样来理解。首先，感性实践活动中的创造并非无中生有，仿佛人能像上帝那般仅凭思维就创造现实，相反，这里的创造需要感性现实的对象，它把人的主体性在对象上实现和确证出来，是一个把人的本质力量(主体性)在对象上现实化和对象化的过程，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人通过自己的外化把自己现实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设定为异己的对象”^[14](P102)。由于马克思已经取消了抽象的精神或上帝，所以，人的感性实践活动就既不是德国浪漫派的诗化活动，也不是黑格尔绝对精神的自我外化，而是人把自身的主体性(本质力量)在感性对象上实现出来并获得确证的活动。因此，在马克思这里，对象就不是思维的抽象对象，而是感性现实的对象，对象在感性实践活动中作为主体性的确证被保留。但仍值得追问的是，这种主体性在对象上的实现和确证为什么是一种创造而不是消灭？问题的实质在于，马克思归还给人的主体性与在德国浪漫派、黑格尔那里的精神的主体性之间究竟有什么区别。如前所述，在德国浪漫派和黑格尔那里只有精神才具有最高的主体性，它作为人与世界的最初根据和最后归宿拥有某种先验本质，人与世界只有在向精神的先验本质复归的过程中才拥有主体性，一旦复归完成，就是黑格尔所谓的“历史的终结”，即主体性的最终完成和自我消灭。而在马克思的理解中，人通过感性实践活动实现的主体性不是向着某种先验本质的复归，而是自由的创造，人在自由的创造中走向无限的可能性而不是某个先验的目的，所以，对马克思而言，人的未来是开放而非封闭的，是在感性实践活动中不断创造着、实现着和丰富着的。

感性实践活动是一种创造活动，也是一种自由的活动。在马克思那里，人的自由本性需要通过人的感性实践活动来证明。人的自由本性在于，他不是具有某种先验规定的现成的主体，而是在实践活动中不断生成的主体，他的存在(感性实践活动)先于本质规定。人通过感性实践活动在现实对象上展现他的生命力量，确证他的主体本质，证明他是自由的主体，因此，人的自由本性的实现与他的感性实践活动是同一的，人作为类存在物正在于对这种同一性的意识：“正因为人是类存在物，他才是有意识的存在物，就是说，他自己的活动对他来说是对象。仅仅由于这一点，他的活动才是自由的活动。”^[14](P53)把自

己的生活作为对象意味着人能自觉地意识到,他的存在与他的本质规定之间不是全然等同的,他的本质规定是在实践活动中历史地创造和形成的,正是存在与本质的这种分离使人具有了自由的可能性。

然而,如何使自由的可能性转变为自由的现实性,这对马克思而言是更为迫切的任务,因为这种转变是让反讽思想转化为现实的力量,从而真正实现理想与现实的和解。对此,马克思的回答是,通过改造世界来使自由现实化:“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的过程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14](P54)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就是证明我们是自由的存在物,而改造世界就是通过实践活动在外部世界确证人的主体性,因此,实现人的自由本性的关键就在于感性实践活动。改造世界的一个基本环节就是改造社会,把社会塑造为适合人自由地实现其生命本质的联合体。为此,马克思把目光转向现实的国家和社会,他说:“政治国家是人类的实际斗争的目录。可见政治国家在自己的形式范围内从共和制国家的角度反映了一切社会斗争、社会需求、社会真理。”^[15](P8-9)正如我们熟知的,当马克思完成对黑格尔的国家理论的批判和对现实国家社会的考察后,他就开始为倒转了的反讽思想寻找现实力量,这个力量就是无产阶级。

三、反讽思想的现实化与无产阶级革命

自由的人通过创造性的感性实践活动展现、确证其主体性,并通过对象确证自身的生命力量和自由本性。在这个过程中,主体在创造自身本质的同时保留了对象,这在理论层面完成了反讽思想的倒转,使反讽成为创造性的而非消灭性的力量。但是,反讽不能只停留在理论层面,它还必须将自身现实化为具体的物质力量以改变世界。这是弥合理论与现实之间鸿沟的唯一途径。从何处入手改造世界呢?马克思认为是社会,因为“个体是社会存在物。因此,他的生命表现,即使不采取共同的、同他人一起完成的生命表现这种直接形式,也是社会生活的表现和确证”^[14](P80)。人既是个体又是总体,作为个体,人是现实的、单个的社会存在物;同时,人又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是社会自觉地思考和感受的总体。人存在的这两个维度以有机的方式统一在社会中,个体的本质需要在总体中实现,总体的特征由个体构成,社会就是个体和总体相互交织、纽结与规定的有机体。就此而言,理想的社会应当是个体与总体的有机统一与和谐,作为社会集中体现的国家应当保障个体的自由,因为当个体通过感性实践活动现实化自身的自由时,人的总体类本质也得到了实现并体现在现实的国家中:“个别公民服从国家的法律也就是服从他自己的理性即人类理性的自然规律。”^[16](P228)单看这一点,马克思的观点与黑格尔的国家理论非常相似,但他超越黑格尔的地方在于,他把人的现实生活作为国家的前提,认为理想生活应当贯彻在一切社会生活样态中。黑格尔把精神视为这个前提,并且以为使精神获得自我意识的哲学活动就是理性的实现,这导致他“处处陷入它的理想使命同它的现实前提的矛盾中”^[15](P8)。因此,要解决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就必须考察国家的现实前提,即考察人的现实的日常生活。为此,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的国家理论。

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国家理论错误地颠倒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把国家当成社会的前提:“家庭和市民社会都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是真正活动着的;而在思辨的思维中这一切却是颠倒的。”^[17](P10)由于这种颠倒,国家和社会处在异化关系中,国家被当作现实和经验的基础,成为真正的主体;市民社会则变成了非现实的客体,必须借由国家才能获得自身的规定性。总之,在黑格尔那里,原因变成了结果而结果却变成了原因,这导致了他对国家和社会根本关系的曲解,进而造成了他用异化了的的关系当作评判现实国家和社会的理论依据和尺度,并在最后得出了君主制是绝对理性和绝对自由的体现这一荒谬结论。对于黑格尔的错误,马克思指出:“黑格尔没有把普遍东西看作现实有限物的即存在的东西、被规定的东西的现实本质。或者说,他没有把现实的存在看作无限物的真正主体,这正是二元论。”^[17](P32)换言之,黑格尔以抽象的观念为标准来衡量现实,他预先在观念中设定国家的结构后再从现实中去寻找符合观念的社会特征,对他来说,在现实中找到并重新认识已经在观念中自明的东西,这就完成了现实与

理想的和解。当哲学完成了对一切现实的考察从而达到观念的自我意识时,哲学就在思维中完成了观念与现实的一致,它就没有什么能做的了。这便是黑格尔的结论。

黑格尔理论的终点就是马克思批判的起点,通过批判,马克思超越单纯抽象的观念而迈向现实。在马克思看来,观念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只能通过分析现实并改造现实才能解决,这是由人的感性实践活动的本性决定的,同时也是倒转反讽思想的内在要求。那这个有待分析和改造的现实是什么呢?正是人现实的社会经济生活。因为劳动作为人感性实践活动的具体方式,其结果是财产:“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私有财产作为自为地存在着的活动、作为主体、作为人,就是劳动。”^[14](P70)也就是说,以财产为特征的经济生活是人的生命力量的客观化,是人的主体性的实现,同时也是人的价值和理想的具体呈现。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人的具体的经济生活是什么样呢?全面异化。对此,马克思指出:“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同劳动相对立……劳动的这种现实化表现为工人的非现实化,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14](P47)异化劳动作为资本主义社会普遍流行的现象,已成为人实现自由本性和本质力量的阻碍,成为需要消灭的对象。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异化劳动违背了人的感性实践活动的本性,也违背了人的自由本性。这种违背体现为两个层面。首先,从个体层面看,劳动是有意识的生存活动,本应该成为实现人自由本性的活动,但在异化劳动中,劳动被降格为维持肉体生存的手段,仅仅作为一种生活和生产活动。工人不能通过劳动确证自身的自由本性,甚至不能保证自身肉体的正常生存,因此,工人作为人却退化成了非人。不仅工人,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中,资本家同样是异化的,他只是占有工人的劳动成果,这个劳动成果不是他生命本质的确证,因而同样是处于异化状态。其次,从总体或类的层面看,异化劳动体现着异化的生产关系,即社会关系整体的异化。手段与目的关系的颠倒在社会层面体现为资本与人关系的颠倒,资本本应作为实现人自由本性的手段,但在异化的生产关系中,资本的自我增值成为目的,人成为服务资本的手段。这种颠倒是对人的类本质的戕害,是对人的主体性的极大压迫,是现实层面实现反讽思想倒转最大的困难。因此,为了实现人作为最高主体的自由,必须在现实中消灭异化劳动,易言之,反讽必须从理论转化为现实,它必须对颠倒了的社会再次进行颠倒。

那么,如何满足反讽思想的现实化要求,如何对颠倒的社会再次进行颠倒?马克思的回答是推动现实的革命运动。马克思深知思维和观念的有限性,在他看来,既然人的异化源于物质和经济生活层面的异化,那么只有通过物质力量才能消灭异化的现实根源:“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17](P207)“批判的武器”是意识或思维,是反讽思想的内在诉求,但只限于此是不够的,若反讽思想不能成为物质层面的实践活动,意识或思维就只是停留在单纯抽象的领域,反讽思想的诉求永远不能被满足,因此就需要在现实的物质层面实现它,实现的方式就是“武器的批判”。“批判的武器”如何转化为“武器的批判”呢?马克思的回答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ad hominem],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ad hominem]。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是,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17](P207)理论掌握人意味着理论在人那里获得自我意识,但这个理论并非客观的观念而就是人本身,是反讽思想诉求的自觉表达,它催促着人(同时也是人催促自己)克服有限性的压迫并自觉地确证自身的主体性。理论唯有如此才是彻底的,才能从意识或思维变为革命的意志,进而造就现实的物质革命。同样的,唯有当人自觉地领会了彻底的理论,领会了他自身内在的渴望和主体性的诉求,他便能够勇于面对并推翻一切客观性的压迫,把反讽思想转化为现实。

什么人能自觉地领会这彻底的理论并胜任现实的革命呢?只有无产阶级才最具有自觉的革命意识和实现革命的物质力量。这里的逻辑如下:无产阶级因其绝对的赤贫(生命本质的彻底丧失)使自己的革命意识获得觉醒,并通过对革命意识的把握将其转化为革命的意志,最后把革命的意志落实在自身之中,把自身当作革命的物质力量进行现实的革命行动。无产阶级成为革命物质力量的逻辑与反讽思想的内在机制是一致的:反讽是消灭性的创造力量,就是说,人主体性的创造要凭借消灭压迫来实现,消灭

的力量越是强烈,创造的冲动就越不可阻挡。用马克思的术语来表达,就是主体性力量的激发与主体受非对象的压迫成正比,非对象的压迫越强,就更能激起主体的反抗,主体越是要将其转化为展现自身主体性的对象。相比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一无所有,是绝对的赤贫,因为他的生命对他而言是彻底异化的,他不仅被迫进行不自由的劳动,还被剥夺了劳动的成果,这种彻底异化的极端情况是工人成了他自己的敌人,本该作为实现主体生命本质和自由本性的劳动,反过来成为迫害和压抑他主体性的最大敌人:“工人自己的体力和智力,他个人的生命……是不依赖于他、不属于他、转过来反对他自身的活动。”^[14](P51)人成了自己的敌人,这是最大的压迫,无产阶级就遭受着这最严重的压迫,为此他必须以最强大的主体性力量去反抗压迫,因此只有无产阶级能自觉地把握反抗的意识。同样是因为绝对的赤贫,无产阶级能把反抗的意识化为革命的意志,“由于在无产阶级身上人失去了自己……而且还直接被无法再回避的、无法再掩饰的、绝不可抗拒的贫困……所逼迫而产生了这种非人性的愤慨”^[18](P262)。无产阶级在现实物质和社会生产关系两个层面都遭受着非理性的压迫,他是无辜牺牲者,因此要求得到补偿。当无产阶级意识到这种补偿的无望时,革命的意识就化为愤怒进而作为革命的意志,推动着无产阶级在现实物质层面满足反讽的渴望和主体性的诉求。这样一来,革命的意识就成为现实的革命行动,无产阶级革命化为怒火烧向了一切压迫。

四、结 语

面对启蒙思想对世界的祛魅,德国浪漫派希望借助反讽思想来重新为人唤回精神和神性,但由于在德国浪漫派这里,反讽思想是通过消灭事物的客观性来实现对精神的复归,这就使它成为一个自相矛盾的存在,它唤回精神的过程最终导致了主体性(精神)的自我消灭。黑格尔把精神的主体性赋予人,把无数拥有精神主体性的个体联合在社会中,试图以此实现有限与无限、理想与现实的统一。但由于黑格尔仍然迷恋抽象的精神,他的方案最终只停留在了单纯的观念和思维中,未能触及现实中的和解。马克思彻底化了黑格尔的方案,取消了抽象的精神从而使人的主体性提升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将德国浪漫派和黑格尔那里的否定性的反讽思想倒转为肯定性、创造性的反讽思想,并把无产阶级视为实现这种肯定性反讽思想的现实力量,开启了真正的、现实的实现理想与现实和解的道路。

当我们从德国浪漫派的思想脉络进入马克思的早期思想,我们可以展示出一个更加立体的马克思。面对一个由启蒙造成的虚无主义横行的时代,马克思真正找到了克服虚无主义的道路。而将启蒙的虚无主义维度深刻地揭示给马克思,并启示他思考克服虚无主义的现实道路的正是德国浪漫派。马克思从德国浪漫派那里继承的绝非仅仅是语言上的修辞,更重要的是,他洞悉了浪漫派语言修辞背后的真正意图——克服启蒙带来的人的异化并回归本真自由的生活。马克思真正超越德国浪漫派的地方在于,他为德国浪漫派的理想找到了现实的实现途径。

参考文献

- [1] 维塞尔. 马克思与浪漫派的反讽——论马克思主义神话诗学的本源. 陈开华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 [2] 刘森林. 切入现实: 马克思对德国早期浪漫派的批判与超越. 中国社会科学, 2015, (8).
- [3] 贾民, 陈益欣. 现实主义, 抑或浪漫主义——论马克思美学的生活底蕴. 哲学研究, 2015, (3).
- [4] 赵锦英, 刘森林. 现代性批判: 从浪漫主义人论到历史唯物主义人论. 现代哲学, 2017, (2).
- [5] 刘森林. 反讽、主体与内在性——兼论马克思哲学中的反讽维度. 现代哲学, 2006, (5).
- [6] 刘军. 反讽与复归: 浪漫主义诗歌在马克思思想演进中的作用. 学术研究, 2012, (12).
- [7] 以赛亚·伯林. 浪漫主义的根源. 吕梁、洪丽娟、孙易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1.
- [8] 弗雷德里克·拜泽尔. 浪漫的律令——早期德国浪漫主义观念. 黄江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19.
- [9] Arthur Henkel. *Der Zeiten Bildersaal: Studien und Vorträge*. Stuttgart: Metzler, 1983.
- [10] 查尔斯·泰勒. 黑格尔. 张国清、朱进东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2.

- [11] 黑格尔. 哲学科学百科全书III. 杨祖陶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 [12] 黑格尔. 精神现象学. 先刚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 [13] 黑格尔. 宗教哲学讲演录II. 燕宏远、张松、郭成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 [14] 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 [1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 [1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From "Annihilation" to "Creation": Marx's Inversion Of The German Romanticism's Irony

Chen YanBo, Chen Mo (Guizhou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rx and German Romanticism has increasingly attracted scholars' attention, which provides a new horizon for us to further clarify the source of Marx' thoughts and understand the problem awareness and thought opportunity of Marx' founding of his new philosophy. In this regard, the German Romantic concept of "irony" can be an important entry for us to understand the rise and development of Marx' early thoughts. Faced with the "disenchantment" of the world by Enlightenment, German Romanticism tried to use "irony" to recall spirit and divinity for man and the world, but they got into a dilemma because of the inherent theoretical contradictions of "irony". On the basis of inheriting Hegel's theory of transforming German Romanticism, Marx abolished the "absolute spirit" as the alienation of human spirit, promoted human subjectivity to the supreme position, and realized the reversal of irony from negative "elimination" to positive "creation", which has not only solved the theoretical dilemma of German Romanticism, but also found the proletariat as a positive revolutionary force for the realization of irony.

Key words Marx; German Romanticism; irony; proletariat

■ 收稿日期 2021-07-18

■ 作者简介 陈艳波，哲学博士，贵州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贵州省中国共产党人“心学”与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高端智库研究员；贵州 贵阳 550025；
陈 漠，贵州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

■ 责任编辑 涂文迁